

清华大学

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报告集

1956-4

第一分册 社会科学类

清华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清 華 大 学

第一次科学討論会报告集

第一分册 社 会 科 学 类

清華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編



机械工業出版社

1 9 5 6

目 錄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第一次論戰	劉弄潮 (3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期對前後時局的關聯	劉弄潮 (8
當前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新形勢及其特點	田福庭 (14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第一次論戰

先烈李大釗對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前哨戰

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8年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我們的先驅者李大釗同志就在北京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首先發表‘Bolshevism 的勝利’，肯定：“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跟着創辦戰鬥的‘每週評論’，在社論‘新紀元’上号召同志們行動起來。接着就邀約同志們調查勞動狀況，從男女傭工一直到人力車夫；並且他還親自寫了一篇‘唐山煤廠的工人’，提倡組織團體。又秘密發行‘工人寶鑑’，鼓吹階級鬥爭。並且在‘新青年’月刊上公開出版‘馬克思研究號’，大張旗鼓地從事宣傳。中國人民在當時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在俄國革命号召之下，在偉大的領袖列寧号召之下，正遇着帝國主義強盜勾結中國的封建余孽，在1919年的巴黎分贓會上加深侵略中國，於是就在全國人民的憤怒中，爆發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進而發展到‘六三’，引起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開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當時潛伏在‘新文化陣營’里的買辦資產階級的丑角胡適，在戰鬥的‘每週評論’出版後，北洋軍閥要驅逐北京大學的所謂過激教授，他感到異常恐慌，就陰謀‘防遏布爾什維主義的潮流’。到了划時代的‘五四’運動爆發，胡適更震駭於羣眾的威力，尤其是震駭於‘六三’運動中無產階級壯大的威力，於是趁着李大釗同志出亡北京的時候，就在‘每週評論’三十一號上奸狡地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來迷亂我們鬥爭的方向，來誘惑一般青年走反動的路，來防遏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迅速地傳播；就引起了我們對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在中國的第一次論戰。不過胡適當時還潛伏在新文化陣營里，表面上裝着是我們的朋友；因為他的機灣防遏，最初的目标不大明顯，所以一般參加的戰士就陷入迷霧陣，單糾纏到‘問題與主義’形式上空洞的爭執去了；只有我們的先驅者李大釗同志，看清了胡適肚子里懷的‘鬼胎’，就從巴黎的五峯，寫了一篇公開的信，登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五號上，理直氣壯地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開始撕破胡適奸狡反動的面貌，一面進行正義的駁斥，一面勇敢地表明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

李大釗同志首先對胡適借口：‘容易被人假冒’，‘容易受人誤解’，私圖分裂‘新文化陣營’；就一面揭穿他的陰謀，一面宣揚自己的立場：“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布爾什維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即陳獨秀）和先生（就指胡適）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評論，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面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面要防遏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

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 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这正是‘五四’运动后一两个月,亦就是‘六三’运动無產階級参加了斗争后,北洋軍閥加强压迫新文化,使‘新青年’月刊陷於停顿,而由胡適中途接办‘每週評論’第二十六号,連報名都不敢用原來的大字,改刊所謂‘杜威講演錄’的大字标题來取媚北洋軍閥的时候;所以当时杜威跑到中國來伙同胡適叫賣的‘实用主义’,内容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及在中國起什么作用?都从反动階級的点头欢迎來具体說明了。就是在反动基礎上高談一点一滴那种改良,实际是粉飾了反动階級丑惡的統治。所以胡適馬上明目張胆,根据反动的‘实用主义’,奸狡地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來繞灣防遏,肚子里藏的是什么东西,李大釗同志已經有了定見,看到胡適翘什么尾巴,早就曉得他要拉什么屎;所以义正詞嚴地从理論上駁斥后,就進一步傳播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义,在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开创时期上,貢獻出影响以后革命極大的五点:

第一,挺身捍衛馬克思列寧主义,大声提醒了進步青年的方向。李大釗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在中國的第一个傳播人,他早就宣傳:“今后的世界,变成勞工的世界”;已經人所共知,現在無需多說。这次論战,突从‘新文化陣營’里冒出奸狡的胡適來反对,在激烈的斗争中,大釗同志受时代的鞭策挺身坚持:“我总觉得布尔什維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們應該研究它,介紹它,把它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随后更駁斥:“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們越發應該宣傳我們的正义。”一再宣揚正义,这真是理直气壯。所以大釗同志始終坚持:“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义……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傳我們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它……以解决具体的社会問題。”这都是从斗争中傳播了中國必須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傳播了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义來指導中國革命的观点。大釗同志的立場这样坚定,态度这样鮮明,战斗能这样击中要害;使‘五四’以后,尤其是‘六三’以后,看过無產階級威力的青年,再經大釗同志这个前哨战,突然从‘新文化陣營’里,初步認識到:原有已經逆时的資產階級反动派的思想,更有正在兴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自命为新青年的人究竟走向那边去,在这次破天荒的論战中已經大声提醒,中國許多初期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都受到这次論战的影响,我們應該从时代的鞭策又來开创时代,这个歷史的关联上來紀念这次論战的勞績。

第二,加速努力中國革命的實踐,順勢促進了以后組党的准备。李大釗同志又駁斥奸狡的胡適把問題和主义分离的看法,指責他拿‘实际需要’來抹煞‘理想主义’的錯誤;所以大釗同志急切向他說:“我覺得問題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問題的解决,必須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里說的‘必須’,就是深信既成了社会問題,就必然要受社会制度的限制,要改革那个社会制度,就必然会有大部分善良的人願意,小部分凶惡的人反对;就是說有階級的矛盾和压制。所以大釗同志繼續說:“要想解决一个社会問題,應該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社会問題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們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义。”把实际的問題和理想的主义結合起來,正是我們一貫遵行的方法。不过在这次論战前,我們虽然已經組織了馬克思主义研究会,已經發出了行动的号召,並且已經順应革命潮流掀起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但馬克思主义研究会,畢竟

一个初期的学术团体,还没有能使可以共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了解实行,就是说还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来宣传我们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起来革命。所以大钊同志当时亦承饒:“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遍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实际問題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也是‘五四’初期的同志太少,所以成績还不大顯著;經過这次从‘新文化陣營’里突出來的論战,就使我們更加多,尤其是更加速來对革命实践的努力;这也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在中國从斗争中傳播,進而來和廣大的工人运动相結合的一个促進过程。

第三,結合中國社会的具体情况,大体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质。李大钊同志不僅說了解决实际的問題,不能离开理想的主义;还進而闡明了实行理想的主义,更不能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他說:“在別的資本主义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用它作工具去驅除这一般不劳而食的官僚強盜。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响,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运用於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現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許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大钊同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义,於‘五四’以前寫‘新紀元’时,就認定十月革命以前的世界,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大不相同’;所以对那認不清國際变化,亦認不清中國社会,妄想在中國实现旧民主主义的那些被称为‘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統思想’者如反动的胡適等輩,大钊同志固然要立即加以反对。並且对那同样認不清中國社会,幻想在非資本主义盛行的國家,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直接起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他还是要及时加以指責。所以大钊同志結合中國社会具体情况,坚决主張:“用以为实际的运动,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適用环境的变化。”更申斥:“被專事空談的人用,就变成空的罢了。”这不僅在当时中國革命的指導上,反对了离开实际的空談家,亦否認了不切实际的初期的‘教条主义者’。並且还大体指出了当时中國的革命性質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社会主义的工具’去打倒‘官僚強盜’的另一种性質的革命。亦就是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改造強盜世界’,‘实行民族自决’,打倒國內官僚強盜的革命。这正是在偉大的領袖列寧感召下,逐漸展开的被压迫民族革命。亦就是我們的領袖毛澤东同志以后把它逐漸具体化逐漸丰富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种初步运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正是大钊同志以后出大力來促成最初的統一战线,經常糾正当时一些急燥同志犯‘左傾幼稚病’的开端。

第四,首先依据唯物史观的学說,在实行方法上主張根本解决。李大钊同志改造社会要拿大多数入需要的主义,來求一个徹底的解决,正是由於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早趋尖銳,決不是一滴所能改良得了;杜威胡適从主观來叫賣‘实用主义’,只是唯心派自欺欺人的騙術,实际上亦只能为反动階級服务。所以大钊同志無論从理論的根据上,从史实的印証上,都是切向他們說:“沒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閉止,……必須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罗曼諾夫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决;今則全部解決了。”可見从十月革命的教訓里,不僅使大钊同志堅決了他革命的立場,而且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观点,亦使他首先掌握了革命的方法。所以他繼續說:“依馬克思的唯物

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它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它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它們都跟着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的解決。”這確是唯物派和唯心派觀察問題，處理問題，根本不同的所在；亦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派思想，一貫對抗的所在。大釗同志從根本上首先掌握革命的方法來進行鬥爭，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真是第一個了解唯物史觀，第一個運用唯物史觀的先覺戰士！

第五，明白指斥第二國際的錯誤，在革命立場上鼓舞階級鬥爭。李大釗同志不僅對胡適唯心的欺騙改良加以攻擊，就是對一些人的機械唯物論亦及時出來指斥；因為機械的唯物論者，否認人類在可能範圍內的努力，只曉得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知道那被決定的人們的意識，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轉而影響和作用於人們的社會存在。所以馬克思教導我們：“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這就告訴我們：要改造社會，必須努力階級鬥爭的實踐。所以大釗同志在當時就認為：“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它的第二說，就是階級鬥爭說（當時曾誤譯為競爭，應體整個意義更正）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天只是在羣眾里傳播那‘集產制’必然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着‘集產制’必然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當時距第三國際的成立只有四個月，在帝國主義的封鎖中消息又很隔絕；而大釗同志在偉大領袖列寧的感召下，竟能明白指斥各國社會黨，就是明白指斥第二國際後期的重要錯誤。這正說明他對階級鬥爭，在‘五四’後，尤其在‘六三’無產階級覺悟起來後，已經有進一步地了解，告訴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拿來和廣大的工人運動相結合，才能實現‘經濟的革命’。就是告訴我們：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堅決來進行階級鬥爭，才能實現‘經濟的革命’。這正是在組黨以前，我們就承蒙着偉大領袖列寧的感召，沒有染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流毒，直接受布爾什維克影響的傳統光榮。

以上五點都是李大釗同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的第一次論戰中，開始撕破胡適奸狡反動的面貌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從發展中提出的有歷史價值的貢獻。雖然大釗同志的公開信發表不到兩星期，就被北洋軍閥把‘每週評論’凶橫地封閉了；只是打了一個前哨戰就半途停頓，還沒有打到激烈和理想的精采；但是先驅者的遺產，在大時代的開創中，畢竟是革命史上的丰碑！而且照耀着以後，還看出一些偏‘左’偏右的人，在這幾個大問題上犯錯誤，更覺得大釗同志的貢獻發出了燦爛的光芒！總之，經過第一次論戰發出這篇僅有的文獻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就更昭布在中國社會，使很多進步的青年，轉從‘新文化陣營’里，初步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思想 and 行動的分野，因而加多，進而加速，確定了以後努力的方向。英勇地走到壯大的工人羣眾中來，運用唯物史觀，鼓舞階級鬥爭，來實行反帝反封建的被壓迫民族革命，亦就是來實行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以後把它逐漸具體化逐漸豐富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過這次最初的論戰，正如大釗同志在當時‘每週評論’封閉後就高歌的：“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

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果然，从此以后，各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义，宣傳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同志就逐渐多了。到1920年三月，第三國際，就是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來北京和李大釗同志会商建立党的組織。四月再由大釗同志介紹威經斯基往產業中心的上海和东南的同志具体研究。跟着在全國人民热烈欢迎苏俄第一次对華通告的时候，就決定於1920年5月，由李大釗同志……等出來發起中國共產党的組織了。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召開的時期對前後時局的關聯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期，因為這幾十年來對敵人殘酷的鬥爭，很多珍貴的文獻都逐漸喪失；所以僅憑兩篇殘存的轉載和一點難能可貴的記憶，說法有時就不免發生過分歧。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上，據1951年6月北京初版，7月北京再版，11月北京第二版，1952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以及1952年9月廣州9版，都說：“一九二二年五月，黨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

到了1953年，‘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上就改成：“一九二二年七月，黨在上海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學習中國革命史的同志，一般都認為這個改正是正確的。不過還有一些人沒有注意這個改正，依然拿前幾種版本來隨便談歷史的；亦有已經注意了這個改正，還拿幾十年前‘响導週報社’彙印‘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的‘更正’來懷疑的。這亦不能不算是——一個問題，我們覺得有提出來研究的必要；因為這次大會的時期非常要緊，正遇着中國的南北兩大政變。如果開會的時間是五月，就是在大政變前，那麼了解大會的基本內容和歷史意義是一個樣；如果開會的時間是七月，就是在大政變後，我們了解大會的基本內容和歷史意義又是一個樣子了。具體懇切地說就是：我們黨的政綱和政策，是根據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而定；如果不弄清大會的時期，對於黨的政綱和政策就難於研究，難於理解，更難於發現規律來聯繫運用。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問題，為了使歷史上重要的文獻，不致脫離適應的時代背景，我們覺得有首先提出來研究的必要。

我們學習中國革命史的文件，經常能從文件中去了解時代的背景；轉過來看，如果先研究當年的時代背景，亦可及時考出文件產生的前因後果。現在對於‘二全大會’召開的時期，我們就來先研究當時的時代背景，再看‘大會宣言’的內容，比較同時期的文獻，以及外界的批評，適當參考較有研究的集體編著和時間較老的轉載，証以當事人直接間接的回憶；那麼對‘二全大會’的時期，大体就可以肯定了。

現在先研究‘二全大會’的時代背景，看那期間前後關聯發生那些大事變：

自從英美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直系軍閥吳佩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奉系軍閥張作霖後，於1922年6月2號，北方就發生了大政變，哄跑了北洋政府的偽總統徐世昌。跟着，吳佩孚黎元洪就演唱‘廢督裁兵’的雙簧，6月11號，黎元洪居然傀儡登場，改組所謂政府。而當時的南方政府正派遣北伐大軍，進到江西三路連勝；中國共產黨就於6月中旬開中委會議，發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為民主主義而戰’的口號，反對黎元洪‘復位’，反對正在醞釀的‘聯省自

治’，勉勵國民黨‘寧可戰而失敗，不可與北洋軍閥妥協而失敗’。同時，西南軍閥就假‘聯省自治’的新名實行割據，吳佩孚也假統一的大名實行壓迫，尤其是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於是吳佩孚又勾結英帝國主義者的走狗陳炯明，突於1922年6月16號在廣州開始大叛變；假名擁護當時所謂的‘統一’，要求南方的非常總統孫中山下野，竟敢炮轟總統府，實際就是剷除廣東的民主勢力。相戰到7月中旬，孫中山退到廣州白鵝潭，又連遭到各種舊勢力造成折台的形勢，來附和南北軍閥對峙的所謂‘統一’的壓迫；廣東政府在實力上，在形式上，那時都可以說是‘倒了’……孫中山8月中旬到上海，中國共產黨正有杭州的中委會議，提出民主主義聯合戰綫的初步進行。這一段擇要的概述，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后的時代背景。

再看‘二全大會宣言’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的那些大事變：

第一，宣言上說：“最近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后面，……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里，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吳佩孚雖然在軍事上5月間就打跑了張作霖，但是政治上哄跑北京的偽總統却在6月2號；黎元洪搔首弄姿地爬上政治舞台，已在6月11號。着手改組所謂內閣，更在6月12號；而且還有三分之一的閣員，如最主要的親美派吳佩孚，還在辭謝偽陸軍總長的要職。所以‘二全大會的宣言’上說：‘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里’，如果5月間就這樣敘述，未免把歷史提前了一點；5月以後發表這個宣言，就比較近情近理了。

第二，‘大會宣言’上說：“但是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為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兵’如果實現的統一，是……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廢督裁兵’那個遮羞的幌子，在軍閥政府中流行，不起於1922年5月，而起於1922年6月。在5月間，吳佩孚戰勝奉張以後，不僅沒有拿出那一個幌子，而且還在吳佩孚主張下，發表了很多新督軍；如5月10號，把張作霖免職查辦後，馬上就調派奉天督軍，補派黑龍江督軍。同時，急於擴張勢力，又新派河南督軍，補派陝西督軍。5月23號，還特別發表了甘肅督軍。到了1922年6月，吳佩孚要利用傀儡黎元洪上台，黎元洪才半羞半笑地於6月6號通電各省，以所謂‘廢督裁兵’為復職條件；當天，吳佩孚那幾個大軍閥和幾個北方督軍，才早已準備好了的，分別來電：“願‘廢督裁兵’，請於黎復職後遵行。”6月10號，黎元洪才在天津通電：“各督復電允‘廢督裁兵’，僅於11日先行入都。”從此，那一個遮羞的幌子，才在軍閥政府中流行，甚至變成所謂吳佩孚的主張。‘二全大會的宣言’假如在5月公布，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敘述；而在5月以後發表，就實在合情合理了。

第三，‘大會宣言’上說：“在現今統一呼聲之下，發生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派軍閥假聯省自治的名義，實行割據；同時它派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所謂‘在現今統一呼聲之下’當然指‘徐去黎來’的1922年6月而言。‘一派軍閥假聯省自治的名義，實行割據’；更是指當年6月，尤其是7月的花樣：如6月24號，雲南軍閥通電主張：“聯省自治”；7月1號，湖南軍閥通電主張：“建設聯邦化之單一國家，並使各省自由制定省憲。”跟着就有幾省的代表和一些所謂國會議員，聚在上海叫囂‘聯省自治’了。所謂‘它派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壓迫南方——’，

現在我們還不談壓迫南方的民主革命，這層留在下面講；就連那些‘假聯省自治實行割據’的軍閥，亦被‘它法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加以壓迫：如7月7日，吳佩孚電雲南說：“統一是一件應由國會解決；反對另開聯省會議。”稍後一點，吳佩孚等又電湖南說：“反對聯省自治主張，各省軍人不宜取軌外行動。”所以在5月間的南北軍閥，還不可能‘在統一呼聲之下’，顯出那兩種矛盾的現象；而在6月以後發表這個‘大會宣言’，就是反映當時兩派軍閥對抗的大體真象了。

第四，大會宣言上說：“英國更又贊助暴露了反動行為的陳炯明，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這當然是指1922年6月15日，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才可稱為‘暴露了反動行為’；5月間的文件亦不可能有這樣的敘述，而在6月或以後才寫得出這樣的宣言了。跟着宣言上又說：“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更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6月16日，只是陳炯明叛變的開始，還不致在我們的觀察中，馬上就稱為‘廣東政府倒了’。從雙方的實力觀察，陳炯明當時很怕北伐大軍回師，曾於6月29日，有親筆信向孫中山悔過，說：“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伐部隊，免至相戕……”。再據1922年7月1日，上海的時報載孫中山電：“粵都之亂，我猶不死。16日炮轟之舉，表護法政府尚非全墮。今設行營於黃埔，專待北伐大軍之回戈，則亂實不足平也。”7月2日又載香港電：“孫部北伐軍約萬人，23日由贛回粵。”又電：“孫中山因軍艦笨重，決用小輪載敢死隊攻城，軍艦除海圻‘二’‘三’艘外，余俱調往各處，分擊陳炯明部。”又載當時：“城內混亂，陳炯明迄未入廣州。”甚至連廣州的衛戍司令，當時還守着中立觀望。可見當時廣東政府確有平亂的實力，不致在6月中就被我們馬上稱為‘倒了’。只是在7月，叛軍才又竊廣東省議會和各團體的名義，響應北洋軍閥假統一的號召，要求孫中山下野。7月4日，廣東政府的海軍總長和海軍總司令，亦假全體名義宣言：“贊成統一，請孫下野。”7月8日，海軍總司令又率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軍艦，離開孫中山。同時，海軍陸戰隊，更勾引叛軍佔據了孫中山的長洲炮台，使黃埔行營不能再守了，陷於重圍的孫中山才領坐艦永豐開往省河；經過車尾炮台時，永豐艦尾又受了創傷，不得已才轉到白鵝潭，那時才確有‘倒了’的形勢。所以無論從行政上看，從軍事上看，廣東政府在6月初亂時，還不致被我們馬上稱為‘倒了’，所以有一種轉載，誤為7月1日發宣言，6月下旬就開大會，亦不明當時雙方實力的變化；而相戰到7月中旬，行政上才不成局面，軍事上亦不易挽回；這個時候來發表‘二全大會的宣言’，就可以有‘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的觀察和惋惜了。

再比較同時期的文獻以及外界的批評：

第五，自從北方發生大政變，把徐世昌哄跑過後，中國共產黨就在1922年6月15日開中委會發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7月9日的所謂‘努力週報’就批評：“近日我們收到一本小冊子，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他們的十一條原則，確有轉載的價值。”等到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二全大會的宣言’，又被所謂‘努力週報’於10月1日批評：“中國共產黨近來發出一個宣言，大意是說他們現在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綫，這不可不說是一件可喜的事。”先從那兩篇批評的口氣：‘近日’，‘近來’，以及批評發表

‘二全大会的宣言’是在‘對於時局的主張’以後發表的。再來直接比較‘對時局的主張’和‘二全大会的宣言’的內容：

(1) ‘對時局的主張’上說：“國民黨諸君呵！你們本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應始終為民主主義而戰；寧可戰而失敗，不可與北洋軍閥妥協而失敗。”這正是陳炯明叛變前，國民黨的北伐軍進到江西，一路佔領大庾，一路佔領崇義，一路連佔信豐，南康，贛州；而北洋軍閥吳佩孚捧出了黎元洪後，又於6月11號致電孫中山，請他北上，共謀所謂‘國是’的時候。所以中國共產黨就提醒國民黨歷年與封建舊勢力妥協的失敗，來勉勵他們應始終為民主主義而戰。但是到了發表‘二全大会的宣言’時，却說：“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兩相比較，就可以肯定：‘二全大会的宣言’是發表在‘對時局的主張’以後了。

(2) ‘對時局的主張’上集中在‘打倒軍閥’，其中一連說了六個‘軍閥不打倒’，要想做什麼都不可能，歸結到‘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最後提出的11項原則，第2項只是：“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而對於更主要的‘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黨沒有加入共產國際時，當時負責者卻還是認識不足；只在文中附帶提了几次名詞，甚至在很多地點，連名詞都用為‘外來的政治經濟力’，‘外力壓迫’，‘吳佩孚的背後也有一種外國勢力’，尤其在最後提出的11項原則，第1項亦只提出：“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權。”沒有鮮明集中地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那正是在沒有加入共產國際時，就是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當時負責者主張上認識不足的具体表現。跟着廣東叛逆在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下，在北洋軍閥的勾結下，發動炮轟總統府的大叛變；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指出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然後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最後更結品地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兩大基本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口號。我們從這一幕歷史發展的順序來看，‘二全大会的宣言’當然制定在‘對於時局的主張’以後，至少在兩三個星期以後，才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來發表；可以肯定：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在1922年7月或以後召開的了。

適當參考較有研究的集體編著和時間較老的轉載：

第六，據中國歷史研究会1937年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立場，觀點，方法，都比較正確。其中提到‘二全大会’的地點，雖然還值得研究；但是敘述到開會的時期：“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各方面史實的研究，我們認為有正面參考的價值。

第七，據日本1933年編的‘支那共產運動’，內容當然是出於反動的記載；不過對於‘二全大会’召開的時期，在較老的文獻缺乏時，敘述‘年月’的‘轉載’，卻不妨借來印証參考。它在敘述‘共產黨史第一期’上，雖然還因襲轉載錯了；但在最後的年表上，卻於1922年下，肯定為：“7月二全大会。”這種敘述‘年月’的‘轉載’，也不妨作為一種反面的參考。

第八，据曾經参加过中國革命的葛薩摩夫編的‘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虽然原編还有一些顯然的遺漏和錯誤，又經過反动机关最初翻譯的歪曲和竄改；但是編書的年代，只隔‘二全大会’四年多；对‘二全大会’的月日，都記得逐漸詳明。先看由英譯本改譯的中文本，开始說：“1922年6月（也許是7月）里，党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会開幕。”那里虽不能确定是7月，但決不是5月很明顯。随后又說：“赶走了孙中山。这个打击發生在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会剛剛結束以后。”这不僅肯定了‘二全大会’是在7月召开的，而且孙中山离开廣州，亦正是在我們的‘二全大会’以后。再看由俄文本改譯的中文本，开始在第12頁上說：“1922年‘六’‘七’月間，中國共產黨又成立第二次大会。”除了決不是5月，說‘六’‘七’月的中國語气却更清楚了。随后在第13頁上又說：“1922年7月12日，適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会將閉会之时。”这就不僅年月清楚，日期亦大体可以明白了。这里还要附帶研究的，原編敘述这个日期，据上下文的意思看，正是为的那本書要追述在廣東的民主势力受打击，陈炯明已經叛变，打败了孙中山的那一段。不过現在要分析的，那里並沒有誤認為陈炯明在廣東叛变是7月12号，而是敘述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会在7月12号將閉会之时，正当着陈炯明在廣東叛变，孙中山已經退到白鵝潭，形式上已經不成其为政府，受到嚴重打击的一幕了。所以‘二全大会’召开的时期，据客觀的分析和研究，应当推定在7月12号前后。

第九，我曾經和参加这次大会的李达同志研究，他亦从当时的天气很热，蔡和森同志还打开自來水管冲头，來回憶‘二全大会’确实在7月。

总之，根据‘二全大会’的时代背景，和‘大会宣言’的各种内容，比較同时期的文献，以及外界的批評，適當参考較有研究的集体編著，和時間較老的轉載，以及当事人直接的回憶，都可以考定：“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会確在1922年7月中旬召开的”。

至於‘二全大会’召开的地点，这里亦需要附帶研究一下，对問題分歧的了解才能更全面。据李达同志告訴我：“二大开会的地点，确在上海；而且有一組在南成都路補德里6号开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老同志，一个湖北的老同志，从他們当时工作的关系上間接回憶，都說：“在上海开的。”我从多方面研究，亦認為确实可靠。因为过去分歧的兩種說法，另一个就是誤为杭州。但是据我的研究，在杭州开的不是‘二全大会’，而是1922年8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議。

第一个根据就在前面所引‘支那共產运动’最后的年表上，於‘二全大会’后，簡要列出：“8月中央西湖會議。”顯然后面的西湖會議，不是前面的‘二全大会’。

第二个根据是在前面所引‘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上說：“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杭州开中央委员会。提議中國共產黨与國民黨須为有組織之联合，一致通过。”这正是孙中山1922年8月14号轉到上海，我党派李大釗同志和他初步商談联合战綫的时期。所以杭州西湖會議是8月的中央委员会議，而不是7月的‘二全大会’。

推究过去說法的分歧，都是由於1922年，在‘六’‘七’‘八’三个月中，中國共產黨一連开了三个重要會議；時間久了，珍貴的文献又在殘酷的恐怖中屢遭喪失；記憶，傳聞，总容易混淆。不僅‘二全大会’的地点是这样，就是‘二全大会’的时期，据我在1927年問过一个同志，他告訴我

說：‘向導週報社’彙印‘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時，當時的編者認為‘三全大會的宣言’在‘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之前；所以看‘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一再稱贊國民黨，一再鼓勵國民黨，好像是先依着‘二全大會’要參加民主革命的号召，才在‘對於時局的主張’上提議建立聯合戰線的宣傳；因此，就誤認‘二全大會的宣言’，應該發表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之前；所以在彙印‘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那一本書的‘二全大會宣言’後，來一個“誤排七月”的更正。其實據我們的研究，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正在北方大政變以後，南方大政變以前，孫中山派遣北伐軍到江西連勝的時候，就先提出：“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開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跟着政局的大變化，廣東政府雖然倒了，但是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不會消滅，所以我們召開‘二全大會’又才發表宣言号召工人農民參加民主革命。所以當時彙印的‘更正’，才是真正的誤排。現在為了尊重正確的史實，使重要文獻不致脫離適應的時代背景，我們應該把它更正轉來，而且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上早已把它更正轉來。現在只是通過這次具體的研究，使我們更深地体会到：要理解黨的政綱和政策，首先就要分析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才能從時代背景來看大會的內容，從整個影響來求相互的關聯，為已經統一了的說法得到一個合情合理的證明罷了。

当前反殖民运动的新形势及其特点

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日益瓦解，是戰後時期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當前殖民地和落後民族解放運動的空前高漲極大的震撼着帝國主義體系，1939 年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 15 億人口還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而目前已經有 12 億人口擺脫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枷鎖，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特別是亞洲大多數獨立國家的出現，在決定全世界命運方面正在起着積極的作用。各國人民正在越來越勇敢地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正如赫魯曉夫同志所說的：“被壓迫人民對獨立和自由的不可遏止的願望已經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誌。”

殖民主義是一種萬惡的剝削制度，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制度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指出：“帝國主義底特點就在於：整個世界，如我們所看見的，現在分成了巨大數量的被壓迫民族和區區少數的擁有巨大財富和強大軍事力量的壓迫民族。”帝國主義時代殖民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採取資本輸出，對落後國家進行掠奪和剝削，把落後國家變為它們壟斷的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變為它們的軍事戰略基地，從而阻止落後國家的生產力的發展，使落後國家長期處於停滯、極端貧困和破產的狀態。所有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經濟上都是不獨立的，沒有自己強大的工業，而成為宗主國的工業原料、糧食和礦產原料的單一作物供應地：如非洲的輸出，岡比亞 98% 是花生，桑給巴 73% 是丁香，南非聯邦 73% 是黃金，南羅得西亞 64% 是黃金和菸草，黃金海岸 68% 是可可，蘇丹 67% 是棉花，利比里亞 90% 是橡膠。如拉丁美洲各個國家的出口額：古巴依靠糖，危地馬拉和哥倫比亞依靠咖啡，委內瑞拉依靠石油，玻利維亞依靠錫，智利依靠銅和硝石。而在亞洲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世界原料市場黃麻的主要供應者，印度尼西亞和馬拉亞則是橡膠。這種單一的經濟結構形成殖民地附屬國經濟的片面性發展，並且加深了他們對宗主國的依賴。

帝國主義操縱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經濟命脈，他們除了直接資本輸出外，並且通過不等價交換，通貨膨脹的掠奪，各種各樣的強制性勞動以及奴役性的條約等獲得了大量的利潤。如 1945—1952 年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達二十億九千萬美元，而獲利達五十八億二千九百萬美元。美國石油公司的利潤在國內為 11%，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為 35%，而在沙特阿拉伯高達百分之七百。由於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使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生活處於極端貧困和愚昧的狀態。如聯合國秘書處發表的 1949—1950 年的世界經濟情況表明：將近世界人口 $\frac{1}{3}$ 的國民收入（包括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平均每人每年還不到 50 美元，在非洲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還不及歐洲人平均收入的 $\frac{1}{5}$ 。在非洲，尼日利亞 13 萬居民才有一個醫生，在德蘭斯瓦爾 15 萬人才有一個醫生。在殖民地時代的印度死於飢餓和瘟疫的每年達到 500—600 萬人。印度人平

均寿命只有 23 歲，南美秘魯的居民平均寿命只 30 多一点。曾經对世界文明有过重大貢獻，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下造成文盲充斥，如战前印度有 88% 居民不識字，中國有 89%，而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則佔 95% 左右。

帝國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它們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它們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紀的东西。封建势力作为它們的主要社会支柱，甚至最明顯的奴隸制度，还在現今的世界上存在着。

由於帝國主义日益殘酷的剝削和掠夺，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运动必然高漲起來的歷史根源。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歷史的新紀元，給帝國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它开辟了帝國主义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时代，同时也开辟了世界各被压迫國家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代。歷史經驗証實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國主义的革命斗争是把他們从压迫与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唯一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極大地削弱了帝國主义体系，由於战争时期苏联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強盜的決定性作用；由於战争时期殖民地和附屬國工業的發展，市場关系的增長，加速民族的形成和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由於战争進程中帝國主义的威信扫地，無論老牌殖民主义者或新兴的帝國主义者都証明了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敌人；由於战争，使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各國人民被大批武裝起來，他們在战争中獲得了鍛鍊、教育並且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这一些因素都極大的加強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覺醒，極大地加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空前高漲。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类型國家取得革命勝利樹立了光輝榜樣，進一步鼓舞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爭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

特别是战后几年來國際形势已經發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的主要標誌，就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个國家的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不断地發展壯大，而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則处于危机状态，削弱，正在不断地喪失着陣地。这一个不同方向發展的歷史進程將決定着人类歷史的命运。

社会主义陣营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坚定不移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外交政策的基礎。特别是自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总理所倡導的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經濟合作等著名的五項原則作为國与國关系的基礎，現在已經得到 20 几个國家的贊成和支持。社会主义陣营是最堅決的奉行着五項原則並且不断抨击着帝國主义的战争政策与殖民政策，因而和平共处的思想已廣泛的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殖民地和落后國要求和平、獨立已經成为全民族的普遍願望。

社会主义陣营不僅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在經濟上支援、帮助新独立的國家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本國經濟。这一切使殖民地、附屬國和新独立的國家在爭取和維護自己民族独立的道路上感到有着比过去更为有利的國際条件。

另一方面，世界資本主义在战后以來不断地削弱、特别是侵朝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失敗，証明了帝國主义已經無法阻擋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被压迫的民族能夠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旦獲

民族能夠發揮巨大的力量維護自己的勝利。這一因素鼓舞了民族運動取得勝利的信心。

戰後以來，美帝國主義已成為最兇惡的殖民主義者。它支持着一切老牌殖民國家並且取而代之，特別是以組織軍事集團和“經濟援助”的殖民政策殘酷的統治和榨取殖民地和落後國人民。因而使殖民地和落後國人民認識到不僅要與宗主國進行鬥爭，而且更要與最兇惡的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

這一國際形勢的變化也反映在殖民地和落後國內部階級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變化。戰後以來，由於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和民族工業的增長，在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工業無產階級有了進一步地成長和壯大，現實生活的教育使得民族覺醒有了空前的高漲，爭取和平、爭取民族獨立的願望已經不只是少數先進人物和先進階層的願望，而已成為全民族的廣大人民的普遍願望而且已經積極行動起來了。

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真正具有世界範圍的性質。反殖民主義運動的空前高漲，已經成為目前國際形勢的一個重要特點，目前絕大多數曾經是處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地位的民族和國家已經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它們正在為維護民族獨立而鬥爭。如亞洲的大部分及非洲的一部分新興獨立國家。繼續處在殖民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正在更堅決地起來鬥爭。如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同時在參加美帝國主義軍事集團的國家要求擺脫美國控制的呼聲在各處都日益高漲了起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已迅速的在瓦解，這是帝國主義進一步削弱的結果，同時也是它進一步削弱的因素。

在這種新形勢下，民族解放運動的特點表現在：

一、反帝國主義鬥爭陣綫的空前擴大，這是戰後時期民族解放運動的重大歷史特點。這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強大與帝國主義的削弱，社會主義的強大鼓舞了民族解放運動，而帝國主義的削弱更加加緊了對殖民地和落後國的剝削。特別是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領域由於新的、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而正在不斷地縮小。因而帝國主義之間爭奪世界市場之間的鬥爭日益尖銳。美帝國主義正在排擠英、法這些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如美國、英國在中、近東爭奪石油原料的鬥爭，美國正在從東南亞，從拉丁美洲趕走英國的勢力，美國正在從印度支那，從北非趕走法國的勢力。殖民者的更替，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了許多更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方式。如中、近東的石油 1937 年美國投資額只佔 13.1%，英國與英荷公司佔 80% 左右，而到 1953 年美國投資額佔到 59.2%，英國則下降到 32.8%。外國壟斷資本（主要是美國）從拉丁美洲抽走的利潤，等於這些國家的國民收入的 $\frac{1}{5}$ 。1955 年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壟斷公司在近東開采了 1 億 5000 萬噸石油，總共只花了 2 億 4000 萬美元。就是說每噸石油不超過 2 美元，但是他們在這批石油上獲得的純利卻達到 19 億美元，一年內就撈回了這一石油地區的全部投資。

貧困和飢餓的加深，民族壓迫的日益嚴重，使得殖民地附屬國反對帝國主義陣綫的空前擴大，它包括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甚至有些國家的部分地主貴族都卷進來了。民族陣綫的擴大不僅表現在人民力量的日益團結和鞏固，而且还表現在許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